

## 兩次世界大戰之間—中德關係： 1919 到 1941/1945

虞和芳\*

### 摘要

本研究為對德國和中國關係的歷史做一探討，它是歐洲馬爾它Dolphin Foundation 科學和文化會基金會與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合作項目的一部分。計畫的任務是以科學的研究和史學的表達，來探討德國和中國從1861年開始至今的外交關係。研究範圍除了外交關係和政治，還包括經濟關係，文化交流和軍事安全。

此研究對 1919 年到 1941/1945 年期間做了一個概述，即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到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第一次世界戰爭後，中德間的互相親近，產生 1921 年 5 月 20 日中德簽署的協議，這是歷史上中國與西方國家站在平等的基礎上，所簽訂的第一個雙方合同。1919-1927 為第一段時期的關係，即德國與北京政府和軍閥，在國民黨北伐戰爭前的關係，德國的外交關係是與當時存在的北京政府，所有其他國家也是一樣，德國與廣州政府為非正式接觸。北伐完成後在 1928 年德國為第一個歐洲國家承認當時在南京的國民政府，雙方訂下外交關係。第二部份為 1928 年到 1941 年間德國與南京政府的關係。直到 1937-1938 這段時間，為德國和中國合作積極親近的關係，而從 1938 年，德意志帝國親近日本。德日同盟導致德國與中國的決裂，在 1941 年 12 月 9 日中國對德國宣戰。然而，德意志帝國的與汪精衛的日偽政府外交關係，維持到 1945 年。

**關鍵字：**歷史，外交關係，外交和安全政策，貿易關係，軍備合作

\* 南華大學歐洲研究所專任研究員



## 壹、導言：德國和中國的關係 1919 年至 1941/1945 年

此文討論的時期為中國對德國宣戰的中德關係歷史時期。第一個時期：第一次世界大戰截止 1919 年到 1927 年為止；第二個時期 1928 年到 1941/1945，即到 1941 對德宣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截止的 1945 年期間。要了解 1919 年戰爭後的歷史，必須先簡短的講述中國和德國之間在 1917 年如何進入戰爭情況。

第一次世界大戰於 1914 年 8 月 3 日在歐洲爆發。日本在 8 月 15 日，對德國提出限期八天的最後通牒，要求德國在膠州灣的殖民地交給日本，德國向中國政府總統袁世凱提議，要把此殖民地歸還給中國，中國在英國和日本的壓力下，不得不拒絕德國這項完璧歸趙的建議。日本在 1914 年 8 月 23 日對德宣戰，未經中國軍隊同意，進軍登陸山東半島，攻擊膠州，德國軍隊，被切斷跟德國的聯繫，只好於 1914 年 11 月 7 日投降，日本佔領青島，五千名德國和奧地利人成為日本的俘虜。

歐洲戰場爆發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外交努力阻止中國加入協約國對德國宣戰。此時德國駐北京大使的前海軍上將 Paul von Hintze，他從 1918 年 6 月中至 10 月上旬為德意志帝國的最後外交國務卿。他與孫中山接觸，孫中山反對與德國宣戰，北京政府在巨大壓力下，對德宣戰，宣戰的後果是所有德國和德國人在中國的財產被沒收。孫中山先生說，中國沒有理由對德國宣戰，也沒有理由參與還在中國的帝國主義列強的對德宣戰行列。相反的，孫中山尋求長期與德國結盟，建設中國和實現中國現代化。因此，孫中山先生說：德國的財產也許可以沒收，但德國的能幹是沒收不了的。<sup>1</sup>

但在 1917 年 8 月 14 日北京中國段祺瑞政府，在英美和日本的壓力下，對德宣戰。宣戰理由為德國在歐洲的無限制

---

<sup>1</sup> Sun Yatsen, Existenzfrage, 1917.



潛艇戰，但對中國航海並沒有影響。中國在第一次世界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沒有跟德國交戰，中國沒有派出部隊到歐洲，但派遣十五萬多名工人，其中部分用於法國在前線附近挖戰壕，約有一萬多人喪生。中國對德宣戰，是在壓力之下，德國和中國之間，不存在戰爭的原因。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國民眾希望戰爭後，中國能與列強英、美和其它國家受到平等待遇，即廢除不平等條約，中國並能收回 1914 年日本佔領的德國殖民地，位在中國山東半島的膠州/青島。兩項在戰爭結束後，都未曾實現，由此在 1919 年，導致中國的五四運動。

## 貳、第一個時期 1919 年到 1927 年的時段

### 一、第一次世界大戰後的情況 1919-1920

中國與德國重新再靠攏和建立新的關係，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是處在一種完全改變的情況之下，德國為這場戰爭的戰敗國。1918 年 11 月的革命導致皇室帝國的覆滅並成立共和國。1919 年 6 月 28 日簽署《凡爾賽條約》<sup>2</sup>，在此條約下，德國不得不放棄其七分之一的領土，失去十分之一的人口。1921 年 5 月在倫敦的會議，依照第二三一條凡爾賽條約戰爭罪的基礎上，推出德國應付戰爭賠償為一千三百二十億帝國馬克<sup>3</sup>，其目的為持續壓制德國經濟的發展。該條約要德國承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戰事爆發，德國是唯一有罪之國，要負全責，這點激怒了大部分的德國人。新組成的國聯，拒

<sup>2</sup> 《凡爾賽條約》協約國和同盟國於 1918 年 11 月 11 日宣布停火，經過巴黎和會長達 6 個月的談判後，於 1919 年 6 月 28 日在巴黎的凡爾賽宮簽署條約，標誌著第一次世界大戰正式結束，於 1920 年 1 月 20 日得到國際聯盟的承認後，正式生效。請參見〈Primary Documents-Treaty of Versailles〉, June 28, 1919, 《維基文庫》, First World War.com [2009-01-10].

<sup>3</sup> 根據協約國賠償委員會決定，德國共需賠償 2260 億馬克 (約合 113 億英鎊)且以黃金支付，後減至 1320 億帝國馬克。1921 年賠償金額確定為 49.9 億英鎊，即 1320 億馬克。賠款加上利息直到 2010 年，才由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還清。請參見維基文庫中相關的原始文獻: Germany to settle, last World War I debt. thestar.com. 2010-09-28[2010-09-28].



絕德國的加入，限制德國的主權，德國對外政治陷於孤立。修訂《凡爾賽條約》，因此成爲德國政策的一個主要目標。

中國在 1918 年似乎是站在戰爭勝利的一邊，爲國聯創始的一個成員。但在談判過程中，最遲在 1919 年 5 月中國卻成爲的凡爾賽條約中的一個失敗者。北京政府指示給在凡爾賽的中國代表團，不能簽署該條約，中國加入參戰，希望恢復不受限制的自主權，這是取消外國列強對中國的不平等條約的治外法權和歸還殖民地的被佔領土，成千上萬參與軍事的中國工人在協約國的法國犧牲生命。然而這項希望成爲泡影。儘管中國在國際聯盟爲正式會員，但是並沒有獲得一個平等國聯成員的資格。半殖民地系統的不平等條約，條約的港口和帝國主義的影響區域繼續存在，實際上部分還繼續二十四年之久。直到 1943 年和英國與美國的條約，才取消外國列強最後在中國的治外法權。中國民眾憤慨《凡爾賽條約》的第一五六條，許諾日本佔據德國膠州灣殖民地，以及德國在山東省的權利和財產，此條文是根據日本和英國之間在 1917 年 2 月的秘密協議。後果之一是群眾大舉遊行，特別是在北京和中國其它地區的學生，於 1919 年 5 月 4 日的遊行抗議。從此出發的五四運動，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轉折點，它顯著的進一步影響決定中國歷史的發展。<sup>4</sup>

因此，我們可以 1919-1920 的中德兩國的關係都在於要取消「不平等條約」。之後二十年中德之間的合作，以此爲出發點。同樣，在這時無論是從中國方面，也從德國方面，都親近同樣與外界政治上孤立的蘇聯。

## 二、1921 年德國與中國簽署的恢復和平條約

由於中國未簽署的《凡爾賽條約》與德國仍然繼續存在正式戰爭的狀態。在 1919 年 9 月 15 日，中國政府宣布戰爭結束，這時中國和德國之間需要另立雙邊和平條約。9 月第一次的外交接觸是透過中國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大使館的

---

<sup>4</sup> Franke, Wilhelm: Chinas Kulturelle Revolution, Die Bewegung vom 4.Mai 1919, muenchen .1957.



聯繫，丹麥是在戰爭中保持中立，中國駐當地大使館負責中國在德國的權益。但這次的談論，並沒有收到正面的結果。

著名的中國作家、政治家梁啟超，1919 年 12 月以私人身份在柏林。德國總統 Friedrich Ebert 接見他，與他會談的人物其中包括重要的社民黨政治家 Philipp Scheidemann。他為抗議在 1919 年 6 月凡爾賽條約辭去首席部長之職。梁啟超提出和平條約要建立在雙方平等的基礎上，德國要放棄以前所有不平等的條約上的權利，來建立德中的友好關係。這樣的合約，會是中國與西方的列強所訂定的第一個平等條約

，它是基於兩個主權國家的平等權利，它能使中國以此合同為範本，以使用於跟其他列強國修訂不平等的條約。

在 1919 年 12 月，中國政府派遣 Zhang Yungai 為非官方的代表到柏林準備談判。在 1920 年 7 月總領事 Dr. Herbert von Borch 為德國代表團的首領到北京談判，Borch 博士精通中文，並在 1901 年為北京德國使館口譯員。自 1911 年以來為德國在汕頭領事，與中國代表團的負責人 Wang Jingqi 談判歷時八個月。<sup>5</sup>這時期的中國內戰，軍閥統治和北京政府的內部鬥爭，加重談判困擾。德方關心的主要問題，至少部分退還由戰爭沒收德國所有權的財產歸還給原主。支持是德國立場的顏惠慶博士，他曾任中國駐柏林大使。

1921 年 5 月 20 日德國與中國簽署恢復和平條約。<sup>6</sup>這是基於平等原則上的協議，如梁啟超在 1919 年的柏林會談中的建議。德國為第一個西方大國放棄所有之前不平等條約的權利，並承認所有凡爾賽宮條約對中國規定的義務，儘管中國沒有簽署該條約。其中規定包括在 1900 年，德國部隊從北京擄獲的，康熙乾隆皇帝時代建成的天文儀器，其中一些由德國耶穌會士建造。這些儀器在同一年完璧歸趙。一次大

<sup>5</sup> Lagebericht Herbert von Borch an AA Berlin 12.04.1921, AA (Auswaertiges Amt Berlin) Politisches Archiv, R 85458.

<sup>6</sup> Der deutsch-chinesische Vertrag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Friedens-Zustandes 20. Mai 1921, BArch (Bundesarchiv Berlin Lichterfelde) R 43/I, Nr. 56.



戰期間在中國沒收的德國資本資產問題，也令德國人得到滿意的和解。

### 三、1921 年至 1927 年期間

1921 年所訂的合同還不能在短期內發揮全面的政治潛力，因為 1920 年代初期，雙方內部危機和必要顧及的外交政策，使得德中合作受到限制。在 1916 年至 1927 年，中國領土分裂，受到地方軍閥割據，內戰般的互相衝突，除了國際公認的北京政府，跟德國在 1921 年簽訂的條約外，還有廣州的對抗政府。在 1921-1922 和 1923-1925 年以孫中山為總統，直到其過世。北京政府受到掌有軍權者的換來換去，相互衝突合作，這種情形每況愈下，以致政府財務是如此的拮据，有時不能維持駐外交機構經濟上的開銷。

德國 1920 年早期陷在類似危機情況。1923 年因為遲繳的戰後賠償，法國開始軍事佔領魯爾，比利時亦出軍。<sup>7</sup>這危機使國內政治動盪，其結果導致不安，分裂運動和暴亂。十月薩克森州 (Sachsen) 和圖林根州 (Thüringen) 受到「紅十月」的口號下，導致長期準備的共產主義的叛亂。11 月，希特勒在慕尼黑發動政變，德國人的儲蓄在那年受到惡性通貨膨脹

，變成毫無價值可言。這兩種政變都受到警察和國防軍的平息。總統 Friedrich Ebert 在這段國家危機的時間，授權於 Hans von Seeckt 將軍獨攬大權的權力。Hans von Seeckt 禁止納粹黨 (NSDAP)，即希特勒的黨以及德國共產黨。在 1933 年至 1935 年，Hans von Seeckt 將軍為中國蔣介石的軍事顧問。

德國駐北京大使於 1921 年到 1928 年為 Adolf Boye。他實行平等的政策和嚴守在中國境內事務的中立，整體政策持謹慎態度。北京政府在這個時候，由於一再的認為出於中國的利益，在國際事務中繼續站在協約國的一邊，反對德國的利益，因而在這段期間中德關係的發展並不滿意。Boye 在

---

<sup>7</sup> Fischer, Conan "The Ruhr Crisis 1923-1924," oxford/New York 2003.



1923 年 9 月 20 日給柏林外交部的信上抱怨：「歐洲對德國不義之處，中國代表毫無例外的，站在我們的敵人那邊，而這些代表為中國呼籲權利和正義。」<sup>8</sup>。舉例如劃分以前德國的 Oberschlesien 和分配 Kattowitz 的礦山及工業地帶給予在 1918 年新成立的波蘭國家。在 1921 年 3 月 20 日的公民投票 59.6%對 40.4%，大部分的票贊成德國保留那些領地。在巴黎的大使會議決定下，中國代表也在其內，決定 Schlesiens 的分劃，將東南部地區分配給波蘭。這裡必須提及在割讓給波蘭的該地區，是大多數票贊成歸屬為波蘭。

### (一)、非正式的與廣州的國民政府關係

在孫中山領導下的廣州對抗政府，比北京政府顯著對德國友好。孫中山先生一再的建議與德國合作，努力的要想讓德國政府承認在廣州的國民政府。在 1921 年 6 月，他派遣朱和中<sup>9</sup>將軍為全權代表去柏林，履行秘密任務，跟德國以前駐中國的大使，海軍上將 Admiral Paul von Hintze 聯繫，並邀請他到廣州當顧問。孫中山那時的想法是成立三國同盟 Dreier Buendnis：德國、俄羅斯、中國，目的在於統一中國，現代化和建設。von Hintze 介紹朱和中將軍接觸德國工業界，至於政治層面，只有非正式的會談。德國當時外交政策以德國重新融入歐洲同體為首位。

德國 1921 年已與國際所承認的北京共和國政府簽訂條約。德國不可能單槍匹馬認可中國的廣州政府。德國對中國的政治，小心謹慎。對中國的內政方面，繼續嚴守中立為謹慎政策。<sup>10</sup>朱和中將軍只能跟德國工業 Hugo Stinnes 以及與

<sup>8</sup> Adolf Boye an Auwaertiges Amt Berlin 20.09.1923, AA Politisches Archiv Abt. IV.

<sup>9</sup> 朱和中 (1881-1940)，國民黨政要，湖北建始人。早年入湖北武備學堂。後留學德國，加入同盟會。辛亥革命爆發後回國，任南京臨時政府陸軍參謀部第二局局長。1924 年後，曾任廣東兵工廠廠長、國民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員等。1940 年 6 月在重慶病逝，  
<<http://baike.baidu.com/view/414326.htm>>。

<sup>10</sup> Bericht des Gesandten in Peking Adolf Boye an AA Berlin 26.11.1926, BAch (Bundesarchiv Berlin Lichterfelde) R 9208/2233, BI. 186-192.



Krupp 和 Siemens 公司會談，發展合作的項目，但無法獲得德國政府官方政策的支持。這聯繫在 1922 年 6 月因陳炯明軍事政變，孫中山先生逃到上海後暫停。

孫中山在 1920 年設法爭取美國的支持，可是沒有取得多大成功。他並在 1921 年至 1922 年努力爭取德國的支持。可是那時德國的政治和經濟疲軟，不能在此時達成的有效的成果。他轉身傾向蘇聯，1923 年 1 月 26 日，他在上海與蘇聯外交官 Adolph Joffe 簽署《孫文越飛宣言》<sup>11</sup>聲明說。孫中山認為共產主義不適用於中國，越飛表示，中國迫切的任務是完成國家統一和獨立，蘇聯願提供幫助。（見王南：孫中山生平大事年表）。越飛在德國並不陌生，因為他是 1917 年 11 月至 1918 年 1 月，俄羅斯代表團的第一負責人，在 Brest-Litovsk 談判德國和俄羅斯的和平條約。他從 1918 年 4 月為駐柏林大使，在 1918 年 11 月，連同蘇聯總代表團被德國驅逐出境，因為他協助德國共產主義政變。

孫中山在 1923 年 2 月回到廣州後，以《孫文越飛宣言》為基礎，跟在 1921 年創建的中國共產黨聯合成國民黨的統一戰線，接受蘇聯的物力和人力支持，建立蔣介石於 1927 年北伐成功的軍事和政治基礎。孫中山的目標仍繼續與德國合作，特別是在經濟和技術領域。<sup>12</sup>因此，在這個時候，除了俄羅斯國際共產 Kom-intern 的顧問委員，也有在私人基礎上，為廣州的德國顧問，如企業西門子工程師 Gustav Amann 和 Admiralitaetsrat 海軍軍事領導顧問 Schrameier。

## （二）、國際聯盟的合作

---

<sup>11</sup> 《孫文越飛宣言》，簡稱《孫越宣言》，是孫中山與蘇聯外交部副部長越飛於 1923 年 1 月 26 日共同發表的宣言。內容包括共同努力促成中國統一，強調共產主義和蘇維埃制度不適用於中國，並同意蘇聯無意進行帝國主義侵略下讓蘇軍繼續留駐外蒙古，且不允許外蒙古以獨立國家名義參與中蘇會談。

<sup>12</sup> Sun Yatsen: Brief an Teng Chia-yen in Deutschland 1923, Gesamtwerke Sun Yatsen Bd. 3, p. 9-626.





德國在度過 1923 年的危機後，政治和經濟情況穩定下來。德國外交部長 **Gustav Stresemann**，採取跟以前戰爭的敵方和解的政策，德國才克服外國對其政治的孤立，重返回到歐洲共同體。在 1925 年 10 月的 Locarno 和在 12 月倫敦簽訂的合同中，德國對法國和英國之間的契約保證，長久承認在凡爾賽條約中規定的德國西部邊界。本合同隨即打開德國為國際聯盟的成員，1929 年 9 月 8 日德國成為國際聯盟永久委員會的會員。

在德國加入國聯之際，中國外長顏惠慶於 1926 年 5 月跟德國政府聯繫，建議中國和德國的代表在國際聯盟合作。**Stresemann** 反應非常積極，在 1926 年 5 月 22 日給北京德國使館的電報，告知德國加入國聯後，支持選舉中國在國聯的地位。德國追求修訂凡爾賽條約和中國追求的修訂不平等條約，恢復全面主權，兩國所追求的為類似的外交政策目標。即使在這些關鍵目標沒有出現有利的直接和開放的合作，而中德兩國互相促進對方在國際聯盟中的地位。1927 年 9 月，中國追求中國代表能選上國聯主席，在德國支持下如願以償。在 1927 年 12 月，中國駐里斯本的大使和代表國聯王廷璋<sup>13</sup>成為國聯委員會的主席。

儘管這些外交政策的成功，北京政府在 1926 年至 1927 年情況下降，不能再支援國外服務人員的開支。中國欠國聯會員的年費六百萬法郎，王廷璋接管國聯首席職位，告訴 **Stresemann**，他兩年半以來沒有拿到任何工資，王廷璋以私人的款來補助，在日內瓦的代表團，也陷於極大的困境。

<sup>13</sup> 王廷璋，字子琦，浙江紹興人。畢業於比利時黎業斯大學，獲商學士學位。歸國後，於 1912 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條約司科長。1913 年任大總統府秘書兼外交部秘書。1917 年 8 月，任駐墨西哥公使館一等秘書，代辦使事；11 月調署駐規金山總領事。1918 年 3 月，任北京政府外交部參事。1922 年 2 月，代理外交部交際司司長，外交部通商司司長。1923 年 3 月，任外交委員會事務處幫辦。1925 年任關稅特別會議委員及法權調查委員會顧問。1926 年 2 月，任駐葡萄牙全權公使。1933 年 1 月回國。1940 年 3 月，被汪偽政府任命為公使，在外交部辦事，<<http://www.china-experts.com/gs/w/w23/w176.htm>>。



Stresemann 採妥協調解，解決中國欠國際聯盟的債務，Stresemann 以機密的方式，提供王廷璋十萬德國馬克的信用借款，最初王廷璋拒絕了這一款，然而在 Gustav Stresemann 離開之前，派遣人通知，有可能還是利用這樣機會的款項。王廷璋專程從日內瓦經過巴黎回到里斯本，他要在德國駐巴黎大使館那去先談論。Stresemann 1927 年 10 月 1 日發出給德國駐巴黎大使的電報給 Leopold von Hoesch 說，王廷璋若是提到這事，就重復這項貸款，並請告訴 Stresemann 以何種形式匯入這筆支付的款項。<sup>14</sup>在北京政府轉到南京建立國民政府的過渡危機中，德國對中國的合作也有助於海外融資接濟困難的問題。

### (三)、貿易關係和經濟合作

在 1921 年 5 月德國與中國訂立條約後，儘管受到不穩定的政治和經濟的影響，德國的經濟逐步復甦成長。德國公司又回到了中國。在 1920 年，只有九家德國公司，在 1924 年已經又有兩百五十三家企業，在 1928 年，有三百一十九家德國公司在中國經營。德國大企業公司如西門子，AEG、IG Farben、Schering 都設立分支公司機構，德國出口到中國之值在 1921 年和 1928 年高漲到四倍。從 1922 年起德國在漢口、天津、上海、奉天（今瀋陽）和廣東、成立德國商會，德國和中國的合作，這時最突出的項目為歐亞航空公司，這是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和中國交通運輸部的合資企業。原始計畫為也與俄羅斯的航空公司 WOGWF 合作，成為中國橫貫至歐洲的跨洲航空業。

首先談判始於 1926 年，德國漢莎航空公司代表團訪問北京。該條約符合，孫中山所擬定與外國在中國合作的經濟主要原則，歡迎外國專家和投資，中國要佔多數股票。在 1929 年與美國華美航空運輸協定，中國還沒有享受到平等獨立的主權。在德國和中國的合作協議，是根據中國的法律，雙方

---

<sup>14</sup> Telegramm Gustav Stresemann an deutschen Botschafter in Paris Leopold von Hoesch 01.10.1927, ADAP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 B, Bd.7, Nr.2, S.1-3.



為平等合作的伴侶。德國漢莎航空公司參與三分之一股份，中國的交通運輸部享有三分之二股份，大部分的行政，管理職務人員由中國專家擔任。該 EURASIA 合同協定是為中外合作的模型，可說為在中國的第一個「合資企業」“Joint Venture”。航空交通在 1932 年 2 月才付諸實現，長途飛行要克服廣大的空間和達到政治領土的統合。

在中國建立了綿延 3000 公里的航程，從上海經過南京和濟南到北京以及更遠到達東北的航班。但跨洲的計畫項目

，從中國到歐洲的航線無法實現，由於中俄關係的劣化和日本於 1931 年在東北發動的九一八事變。<sup>15</sup>

## 參、第二個時期 1928 至 1941/1945 年

### 一、1928-1937-38 年期間

在蔣介石 1926 年至 1928 年領導北伐的國民黨武裝部隊 (GMD)，統一中國之時，幾乎是在同一時間的國民黨對中國共產黨 (CPC) 的清黨結仇。國民黨與共產國際和蘇聯的合作結束，蘇聯顧問被解僱。國際認可南京國民政府受到耽擱，因為取消不平等條約和期待訂立在平等的基礎上的條約，跟此認可行動相結合。德國到 1921 年為西方國家唯一與中國訂立公平合約的國家。

然而德國顧慮到尋求歐洲共體化，不願意開先鋒的來承認南京國民政府。但是，反對國民黨的德國駐華大使 Adolf Boye，被召回，代之以 Herbert von Borch，他曾參予談判 1921 年的中德條約。在正式的認可前，Borch 跟南京政府進行聯繫，並與貿易和工業部長孔祥熙會談。美國在 1928 年 7 月 25 日承認國民政府，美國的形式是透過與中國關稅自主權的問題之約。德國繼其後，在 1928 年 8 月 20 為第一個歐洲國

---

<sup>15</sup> Ostasien im Luftverkehr, Ostasiatische Rundschau Bd15 (1934) in: Fabrizek, Uwe G.: Gelber Drache Schwarzer Adler, 1973.



家跟中國訂此協定，也是有關海關事務，該合同即表示承認南京國民政府。<sup>16</sup>

## 二、德國的顧問 1927-1938

國民黨與共產國際的合作終止，蘇聯顧問撤銷後，中國仍然需要外國專家，尤其是對現代化和軍隊的職業化。自十九世紀以來，中德在這方面具有合作的傳統，而且孫中山也有與德國在軍事領域合作的打算。與德國合作的決定因素，為德國和中國之間沒有不平等的條約，德國在東亞沒有帝國主義利益的追求。中國與德國之間的軍事合作，基於 1928 年「凡爾賽條約」是不准許的。在第一七九條所述：它（德國）進一步承諾採取適當措施，德國防止德人離開德國領土，從事陸軍、海軍或空軍，加入任何外國勢力或在其連屬下，提供培訓或指導在陸軍，海軍或航空部門的幫助。但在同一條文其下說：「此一規定不妨礙法國權利，...新兵招募的外籍軍團」。

德國政策認為，要改變修正爾賽條約，要先承認和履行它，此為德國的履約政策 *Erfuellungspolitik*，履行此條約在德國內部非常不受歡迎。像希特勒的煽動家趁此獲益，攻擊民主的魏瑪共和國的政治家，責其為「實行政治家」說他們涉嫌出賣德國給外國。這情況很類似在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和其國內的政治評論爭論。1933 年納粹奪取政權，公開忽略有關凡爾賽的規定條約，由於打破《凡爾賽條約》希特勒沒有受到國外制裁，遵循「實行政治家」似乎信用掃地。

中國實現通過與德國合作，努力爭取非正式的軍官，他們在世界戰爭後不被國防軍接管或者被淘汰。前兩位在中國的德國顧問團的隊長為反對魏瑪共和國的軍官，外交部德國駐中國大使館和國防部意見不一。在 1930 年代，國防部掩飾的透過聯絡官，他們在柏林以平民職業出現，與德國國防工業、中國的顧問接觸聯繫。納粹黨在 1933 年奪取政權，

---

<sup>16</sup> Deutsch-chinesischer Vertrag 20.08.1928, AA Politisches Archiv, R 28541.



違反凡爾賽條約，廣泛的繼續發展德國和中國間的軍事和軍備經濟合作關係，德國顧問的工作人員，高達七十位軍事顧問。此外，還有無數公民專家和技術人員，他們隸屬在德國首席顧問的將軍之下。

### (一) 首席顧問 **Bauer**、**Kriegel** 和 **Wetzell** 1927 年至 1933 年

中國決定邀請德國專家採取非正式的招募，對象為在戰爭後不屬於正規軍，或是被排出軍隊體制之外的專家。來中國的兩個德國顧問領導為 **Oberst Max Bauer** 上校和 **Oberstleutnant Hermann Kriebel** 中校，他們反對魏瑪共和國的政治。在這個早期階段，外交部和德國駐北京大使館是持互相反對的態度。到 1930 年，在中國的軍事顧問，雖然德國外交部反對，國防軍部卻袒護，**General Georg Wetzell** 獲該部批准為在中國的高級顧問。1933 年國家社會主義納粹忽視凡爾賽條約的規定，來自德國的軍事顧問和培訓師有七十名之多，以及許多技術人員。因此跟他們有關的經濟和軍備的德國和中國的合作，成為正式和全面化。在這個階段，由上將軍 **Generaloberst Hans von Seeckt** 為顧問長，他曾任陸軍首長，和他的繼任者 **Generalleutnant 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 陸軍中將。von Seeckt 不是納粹，von Falkenhausen 反納粹。

初步的接觸在北伐的早期 1926 年 12 月。那是透過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教授，他曾在德國大學讀地質學。他寫信給在柏林的前教授 **Conrad Matschoss**，他提到中國的現代化和產業化，旨在激勵德國和中國的合作，吸引德國專家。這封信在工業界圈子傳開來，德國國防部也得知，透過 **Friedrich Krupp AG** 公司，外交部東亞部主任 **Oskar Trautmann** 也得知。**Trautmann** 後來為德國駐中國大使，駐柏林中國大使館試圖聘請德國專家。<sup>17</sup>

---

<sup>17</sup> Brief Zhu Jiahua, Rektor der Sun Yatsen-Universitaet in Kanton, an Prof.Dr. Conrad Matschoss, Berlin, 21.12.1926, AA Politisches Archiv, R 85720.



透過 Ludendorff 的圈子與退役上校 Oberst a.D. Max Bauer 聯繫，Max Bauer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為參謀軍最高司令部 General Ludendorff 的一名僱員。戰爭結束後，他屬於 Ludendorff 的一圈，在 1920 年 3 月 Kapp-Luettwitz Putsch 政變，反對德意志共和國的民主政府，政變未遂。之後 Max Bauer 在蘇聯為軍事顧問。他代表國家布爾什維克 (nationalbolschewistische Ansichten) 的反帝國社會主義 (antiimperialistischen Sozialismus) 的看法，主要是反對大英帝國。<sup>18</sup>從這個意義上說，他想要在中國工作。

Max Bauer 在 1927 年 11 月和 1928 年 3 月訪問中國，朱家驊教授將他介紹給蔣介石。1928 年三月 Max Bauer 上校伴隨中國政府陳毅將軍領導的代表團到德國，為受中國政府邀請退休的顧問人員，定下私人條約，對德國工業界的聯繫也加深。Max Bauer 回答外交部問的詢問，據他所知，沒有德國軍事顧問在中國在那段時間是沒有錯的。因為前十位的在 1928 年 11 月在中國的德國人員，這當然 Bauer 所知的，這些人員僅僅是作為教師在軍事學校工作。實際上，他們也訓練軍隊為積極軍隊的教師，參與中國的內戰。上校 Bauer 得傷寒病倒，死於 1929 年 5 月 1 日的上海軍事醫院。

Bauer 的繼任者是他的前代理，中校 Hermann Kriegel。Kriegel 曾在 1923 年 11 月參加 Hitler-Ludendorff-Putsch 政變，跟希特勒一齊送進法庭，同樣被關在 Landsberg 監獄，直到 1924 年 12 月。諮詢團隊成員，也有一些為保守的官員，都不願意分配到 Kriegel 手下。這些衝突導致 Kriegel 被調入新的首席顧問 General Wetzell 將軍那裏，繼續他在中國的活動。1934 年 4 月，希特勒親自指令 Kriegel 為德國駐上海總領事，他擔任該職務，直到 1937 年 10 月。Wetzell 將軍於 1930 至 33 年，再次透過朱家驊的聯繫到中國。他跟 Max Bauer 在第一次大戰時，為參謀部 Ludendorff 手下工作人員，任命將軍銜的軍官為諮詢團隊的領導，顯示德國國防部對來中國作諮詢的興趣增加。Wetzell 和國防部的聯繫是透過聯絡人員

---

<sup>18</sup> Denkschrift Max Bauer 1927, BA/MA (Bundesarchiv/Militaerarchiv Freiburg) Nachlass Max Bauer, Bd.41.



Brinckmann 中校，他為柏林飛行公司 Arado 的員工。General Kurt von Hammerstein 將軍，自 1930 年以來為陸軍司令部參謀長，1931 年 1 月建議外交部國防部直接跟中國的高級顧問聯繫，外交部避重就輕的回答。在 Wetzell 下約有六十位德國人員，他們大多數是培訓中國部隊的軍事訓練。

## （二）總顧問 Seeckt 和 Falkenhausen 將軍 1933 至 1938

Wetzell 將軍是在中國受到尊重的軍事專家，但他個人跟蔣介石的關係不大好，中國高級官員認為他太傲氣。於是那時為交通部長的朱家驊，1933 年 9 月 30 日發出函件，給著名創建國防軍的上將軍 Hans von Seeckt，邀請他來華。von Seeckt 在 1933 年 4 月第一次訪問中國與蔣介石會面兩次。

Seeckt 從 1933 年到 1935 為德國的軍事和一般技術人員的總顧問，也為蔣介石的戰略顧問。他建議重組的中國軍隊，減少軍隊人數，注重質量，目標為裝備精良，訓練有素的精銳部隊。Seeckt 所關注擔心的是日本會對中國提早攻擊，使得中國沒有時間建立有力量的軍隊。他在 1934 年 2 月 8 日寫給在荷蘭流亡的前德國皇帝 Wilhelm II 的信件中，他寫：「在中國得到的位置，目前為六十名軍官，在我看來，今日德國國外從事的工作，只有很少的機遇，是如此重要...我的工作嘗試，為中國建立一個小而強大的軍隊同時為奠定兵器工業打基礎...日本是否能讓中國重組起來，這是一個時間的問題」。<sup>19</sup>

一個團結、穩定的中國，一個有力的軍隊與日本擴張主義政策的利益相違。因此日本為攻擊中國找到藉口，藉口總是能夠找到的，如 1937 年 7 月 7 日的盧溝橋事變。也正如在 1895 年，中國在十九世紀的自強運動中發動的攻擊朝鮮，引起中日之戰。日本於 1937 年在當時中國亦為內部動亂，在正在往穩定的過程中和現代化中，發動攻擊中國。因此，

<sup>19</sup> Brief Generaloberst Hans v. Seeckt an ehem. Deutschen Kaiser Wilhelm II., Holland, 08.02.1934, BA/MA (Bundesarchiv/Militärarchiv Freiburg) N 247/190.



把德國顧問 1927 年至 1938 年解釋為主要為中國國內戰黨派之爭的觀點，是錯誤的。他們的任務主要是建立現代的，受過教育的裝備軍隊，在中國防禦外面的入侵領土的敵人。這也是日本頑固堅持要德國召回德國顧問的原因。另一方面中國內戰的延續，對日本是有利益。在 1937 年對中國的攻擊，日本侵略時遇到的是勇敢，在訓練中半現代化的裝備兵力。

德國的教育培訓中國軍官人員，為特殊對其所設的受訓部隊。1932 年到 1937 年日本的攻擊期間，約十五萬名中國總參謀部人員在南京的中央軍校接受德國教師三年的培訓。此外，約九萬士官，接受德國專家短期的培訓課程。<sup>20</sup>

1935 年，繼任 General von Seeckts 將軍的為 von Falkenhausen 將軍，von Seeckts 因健康原因返回德國，von Falkenhausen 在 1934 年 2 月在中國為 Seeckt 的代理。自 1935 年以來，他的戰略方式是以空間來爭取時間，他建議在被日本佔領地區使用游擊戰術和堅決軍事，抵抗日本攻擊中國大陸重要點。1937 年 8 月當日軍攻擊上海地區，他還停留在前線督戰，日本政府一再重複的要求德國政府召回 von Falkenhausen 和德國的軍事顧問。von Falkenhausen 透過德國南京駐華大使館，然後漢口說明要保留中國的德國顧問和支持中國，他南京的房子受到日本空襲針對性的襲擊被摧毀，他把一部拍錄下的日本佔領南京，日軍屠殺戰俘和中國老百姓的影片，交給德國大使館。<sup>21</sup>

可是電影中的日人大屠殺中國的平民，不能震撼在柏林的納粹希特勒。希特勒決定跟日本聯盟，他想要透過盟國在軍事上對付蘇聯。1938 年的春天，柏林政治和軍事的高層人物起了重大變化，對中國友好之翼在德國被剝奪政權，日本友好翼能佔上風。德國在中國的顧問被德國政府召回，由於他們不是以軍事任務為基礎，而是跟中國政府私人定立的條

---

<sup>20</sup> Martin, Bernd: Das Deutsche Reich und Guomintang-China 1927-1941, Freiburg/Muenchen 1986, S.363.

<sup>21</sup> Falkenhausen, Alexander von: Was ich dachte und was ich tat, 1948, S.2-4.





約，許多人不遵守命令不願返回德國。德國威脅他們，沒收在德國的財產和取消德國國籍，von Falkenhausen 願意放棄德國籍，德國威脅逮捕他在德國的兄弟姐妹。

在這種情況下，他與蔣介石會談後，雙方同意爲了顧及他在德國的兄弟姐妹，他只好返國。von Falkenhausen 從外事部，德國外交部得到指示，這是日方期望透過 von Falkenhausen 的諮詢，要讓中國人洩氣。交代他要以軍事專家向中國的領導人說，中國對抗日本的戰爭是不能取勝，再多犧牲毫無用處，日本一定會獲勝，因此必須跟日本妥協，這代表要向日人低頭稱臣。德國顧問 1937 年 7 月在離開前，蔣介石跟中國高級將領爲德國的高級軍官籌備惜別會，von Falkenhausen 講了一段話，他的結尾是：要是中國能堅持奮鬥，他作爲軍事專家，能保證勝利一定會屬於中國。

### 三、經濟和軍備的合作

中國和德國之間的經濟關係在 1930 年代年主要是跟軍事顧問有緊密相連，因爲商品的交易重點基於雙方武裝軍備的目的。日本擴充政策日益囂張，中國的武裝裝備是防禦性的，主要目的是防禦日本的攻擊。相反的，德國武備是進攻性的，這是基於希特勒的觀念（Hossbach 協議），準備攻擊滅絕的戰爭，其目標是在征服「生存空間」和建立經濟基礎（原料商品等）。在東歐的自主經濟（總體東歐規劃），這是基於種族社會達爾文主義思想，這與日本在東亞的擴張也有一些類似之處。

中國是德國貿易夥伴的首選，因爲中國能供應豐富的資源，也是購買德國工業產品的大客戶。相反的，日本是一個商業對手，本身爲原料商品進口國。由於德，中兩國缺乏貨幣，商品交易，以彼此貨物代償爲約定互換方式的原則。<sup>22</sup>中國和德國之間的雙邊貿易協定如 1934 年 8 月 23 日訂立的商

---

<sup>22</sup> Ausfuehrungsvertrag ueber den Austausch von Rohstoffen und Landesprodukten Chinas gegen Industrie- und sonstige Erzeugnisse Deutschlands, 23.08.1934, AA Politisches Archiv, R 31249 KI.



業協定和 1936 年 4 月 8 日的信貸協議，使德中貿易繁榮。通過在半官方的 HAPRO（工業產品有限貿易公司）直接交換貨物和供應代扣代繳來處理。中國提供武裝設備原料如鎢、銻和錫，1937 全年中國出口到德國的金屬，佔總量的 22.5%。德國提供的是武器和軍事防禦，全部工業的設施（Fabrikausruestungen 武備工廠）和交通工程（鐵路和港口設施），德國從 1929 年至 1936 年出口到中國的增加，以致在 1936 年中國從德國進口，僅次於美國和高於英國。同樣，德國是世界上僅次於美國的第二大的中國產品買家。

#### 四、轉折點 1937-1938

1937 年 7 月中國財政部部長孔祥熙<sup>23</sup>訪問德國，談論經濟關係和跟 HAPRO 貿易公司的繼續發展。在那裡，他驚訝的得到日本在 1937 年 7 月 7 日攻擊中國的消息，這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東亞地區的開始。1937 年 7 月 13 日孔祥熙在 Obersalzberg 希特勒的阿爾卑斯山家 Berghof 會見希特勒。希特勒說，他希望日本和中國之間衝突能取得協調，並提議德國居間調解，中日的衝突不致影響德國和中國之間的關係。

事實上，1937-1938 年為德中關係的一個轉折點。受到日德戰爭聯盟和中國在 1941 年 12 月 9 日對德國宣戰，直到 1937 年德國在東亞實行雙管政策，延續與中國良好的貿易關係，包括軍事顧問和軍事經濟的商品交流，同時政治親向日

---

<sup>23</sup> 孔祥熙 (1880 年 9 月 11 日—1967 年 8 月 16 日) 長期主理國民政府財政，主要政績有改革中國幣制，建設中國銀行體系，加大國家對資本市場的控制等。孔祥熙祖籍山東曲阜，他路過山東濟南，結識與孔府血緣關係較近的八府長孫孔祥勉，請其代查族譜，通過孔祥熙提供上溯幾代的名字，查實屬於孔氏「六十戶」中的「紙坊戶」。孔祥熙得知自己孔裔身份後十分高興，以德國設計的青島電話機械網絡藍圖一份酬謝孔祥勉，日後常以孔子七十五代孫的身份示以眾人。1930 年，孔子奉祀官孔德成主持編修《孔子世家譜》，孔祥熙不僅捐款大洋一千元，還派員四處查訪孔氏族人。他在《孔子世家譜》卷四十九「紙坊戶」譜中佔據了將近六面。請參閱：孔祥雲，《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冊》（華文出版社，2006）；孔令朋，《孔裔談孔》（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孔令朋，《今生今世》（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本。與日本的聯盟是要藉著日本軍事實力的合作，能將「俄羅斯鉗住」，這種雙管政治，在日本攻擊中國後，不再可能。

德國對東亞政策的權力精英有兩派，為中國翼和日本翼。中國翼政治和軍事家贊成擴充軍備，但拒絕希特勒攻擊性的外交政策，如外交部長 **Konstantin von Neurath**、**Feldmarschall Werner von Blomberg** 元帥（**Kriegsminister und Oberbefehlshaber der Wehrmacht**，戰爭部長和武裝部隊司令）**Generaloberst** 和上將 **Werner von Fritsch**（**Oberbefehlshaber des Heeres** 陸軍最高指揮官）。日本翼為納粹，如德國駐英國大使 **Joachim von Ribbentrop**。他提交英國君主他的就任證書時用「希特勒萬歲」敬禮，他全力支持希特勒的擴張政策。

在 1938 年初，中國翼的上述人物，受到不同的指責藉口將其革職。如 **Fritsch** 是因同性戀，不當行為解職。在他被解僱後，得以澄清他不是同性戀，可是他不能恢復原職，新外交部長為 **Ribbentrop**，希特勒親自指揮三軍。因此這些人員轉向侵略戰爭的方向，跟中國絕裂轉向親近日本。希特勒把東方地緣戰略聯盟日本，抵制蘇聯的政策，放在對中國經濟利益關係之上。

德國親日的政治在 1936 年 11 月抗國際共產的協議明確可見。在 1938 年初夏，德國承認日本傀儡政權的滿洲國，德國更與日本靠近。德國的軍事顧問許多跟他們在中國的任務認同，受到日本的壓力和德國開除國籍，沒收在德財產以及對其在德親戚的種種措施，威脅強迫他們在 1938 年 6 月返回德國。德國大使 **Oskar Trautmann** 在 1938 年從中國被召回國，中國漢口大公報在 1938 年 5 月 26 日的報導：我們對德國顧問的離開感到悲傷，這些顧問在軍事在科學和技術上，盡責任，協助中國建設，他們的成果得到全中國的讚許。我們知道德國顧問，在日本敵對行動爆發以來同情中國。現在他們的政府命令他們返國，這項措施當然不跟顧問們的意見一致，所有中國各界在這告別中都非常的悲傷。<sup>24</sup>

<sup>24</sup> Leitartikel Tageszeitung Da Gongbao, Hankou, 26.05.1938, BA/MA (Bundesarchiv/Militaerarchiv Freiburg) N 246/9.



## 五、1938 年至 1941-1945 年期間

1937 年 7 月日本攻擊中國後，並沒有立即看到明顯德國和中國的關係的惡化，龐大的供應合同總價值為兩百八十二億德國馬克還待履行。國防部和德國工業代表反對日本的要求，反對終止德國對中國武裝軍備的供應以及召回德國的軍事顧問。德國外交政策擔心中國跟蘇聯親近，因而在 1937 年 12 月，德國的外交設法做調庭工作。這項努力最終失敗，這是日本的和平條件令人無法接受，可以看出日本人政策占主導地位的極端民族主義政黨無意於和平，一看到中國有進行談判的意願，日方提高條件並結合短期的最後通牒，最後日本終止德國作介導的談判。<sup>25</sup>

中德關係在 1938 年 2 月惡化，時間上與德國中國翼的政治家和軍方被解雇相同。1938 年 4 月 Herrmann Goering 禁止對中國供應武器裝備的四年計劃。1938 年 6 月，外交部長 Ribbentrop 召回德國的軍事顧問。Falkenhausen 將軍的兄弟姐妹在德國受到威脅，他不得不在 1938 年 7 月 7 日由香港離開中國，在德國沒有家眷的五名顧問，繼續留在中國。德國大使館在 1937 年 12 月 12 日南京淪陷後，跟隨中國政府遷往漢口。1938 年 7 月 Oskar Trautmann 大使跟顧問同時被外交部長 Ribbentrop 由中國召回，Oskar Trautmann 將官方任務交給 Lautenschlager，德國不再任命新的中國大使。<sup>26</sup>

1938 年 10 月，中國政府撤退到重慶，德國大使館不像其它外交使團沒有跟著遷移，相反的搬遷到上海國際地帶，在重慶只通過代理來代表。1940 年 3 月 30 日，日本在南京的佔領軍成立汪精衛的傀儡政府，日本旨在分裂中國。日本政府敦促德國政府承認汪精衛政權，德國在進攻蘇聯幾天後承認南京的傀儡政權。中國在重慶國民政府於 1941 年 7 月 2

<sup>25</sup> Nieh Yushi: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es in Nordchina und die deutschen Vermittlungsbemuehungen 1937-1938, S.90-93.

<sup>26</sup> Letztes Telegramm des deutschen Botschafters Oskar Trautmann, Hankau, an das Auswaertige Amt Berlin 26.06.1938, AA NA?Microcopy, T 120,Roll 1074, Serial 1927H, Aufn. 432887.



日跟德國斷絕外交關係，德國在南京的大使直到 1945 年任職，日本偷襲珍珠港的兩天後，在 1941 年 12 月 9 日中國國民政府向德意志帝國宣戰。

## 肆、結語

希特勒的著想要與日本結盟，以便實現日本加入反對俄羅斯的戰爭，在軍事上如「鉗子」一樣牽制俄羅斯，卻沒有達成。日本在中國擴張的失利後，而箭頭指向東南亞地區，以便實現日本原料供應自給自足的承諾，日本在東亞和東南亞的侵略以及德國在歐洲的擴張侵略都告失敗，194 年兩個國家都崩潰，而結束戰爭。

中國和德國在第一和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爭並非由於雙方的衝突，而是受到第三國家聯盟的影響，導致中國和德國之間才發展成爲雙方有段時間處在對立的陣營。1949 年成立東西兩個分裂的德國，同樣的在這同一個年度，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而中華民國撤退到台灣。這些國家之間的複雜關係，塑造出隨後的幾十年的發展。

共產主義的東德（德意志民主共和國）在 1949 年 10 月 25 日，與中國成立外交關係，直到 1990 年東德瓦解德國統一。西德在 1972 年之前對中國大陸和台灣沒有直接正式的外交關係，但跟雙方都有非官方接觸。1972 年 10 月 10 日，西德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開始兩國之間的正式外交關係，德國與台灣的官方關係並不需要停止，因爲它並不存在，德國與台灣間的關係，透過德國在台協會代表行使非官方大使館的功能。



## 參考文獻

### 中文

- 孔祥雲，《孔氏家族私密生活相冊》（華文出版社，2006）。
- 孔令朋，《孔裔談孔》（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 孔令朋，《今生今世》（中國文史出版社，1998）。

### 英文

- Adolf Boye an Auawaertiges Amt Berlin 20.09.1923, AA Politisches Archiv Abt. IV.
- Ausfuehrungsvertrag ueber den Austausch von Rohstoffen und Landes- produkten Chinas gegen Industrie- und sonstige Erzeugnisse Deutschlands, 23.08.1934, AA Politisches Archiv, R 31249 KI.
- Bericht des Gesandten in Peking Adolf Boye an AA Berlin 26.11.1926, BAch (Bundesarchiv Berlin Lichterfelde) R 9208/2233, BI. 186-192.
- Brief Generaloberst Hans v. Seeckt an ehem. Deutschen Kaiser Wilhelm II., Holland, 08.02.1934, BA/MA (Bundesarchiv/Militaerarchiv Freiburg) N 247/190.
- Brief Zhu Jiahua, Rektor der Sun Yatsen-Universitaet in Kanton, an Prof.Dr. Conrad Matschoss, Berlin, 21.12.1926, AA Politisches Archiv, R 85720.
- Denkschrift Max Bauer 1927, BA/MA (Bundesarchiv/Militaerarchiv Freiburg) Nachlass Max Bauer, Bd.41.
- Der deutsch-chinesische Vertrag zur Wiederherstellung des Friedens-Zustandes 20. Mai 1921, BArch (Bundesarchiv Berlin Lichterfelde) R 43/I, Nr. 56.
- Deutsch-chinesischer Vertag 20.08.1928, AA Politisches Archiv, R 28541.
- Falkenhausen, Alexander von: Was ich dachte und was ich tat, 1948, S.2-4.
- Fischer, Conan "The Ruhr Crisis 1923-1924," oxford/New York 2003.
- Franke, Wilhelm: Chinas Kulturelle Revolution, Die Bewegung vom 4.Mai 1919, muenchen .1957



- Germany to settle last World War I debt. thestar.com. 2010-09-28 [2010-09-28].
- Lagebericht Herbert von Borch an AA Berlin 12.04.1921, AA (Auswaertiges Amt Berlin) Politisches Archiv, R 85458.
- Leitartikel Tageszeitung Da Gongbao, Hankou, 26.05.1938, BA/MA (Bundesarchiv/Militaerarchiv Freiburg) N 246/9.
- Letztes Telegramm des deutschen Botschafters Oskar Trautmann, Hankau, an das Auswaertige Amt Berlin 26.06.1938, AA NA?Microcopy, T 120, Roll 1074, Serial 1927H, Aufn. 432887.
- Martin, Bernd: Das Deutsche Reich und Guomindang-China 1927-1941, Freiburg/Muenchen 1986, S.363.
- Nieh Yushi: Die Entwicklung des chinesisch-japanischen Konfliktes in Nordchina und die deutschen Vermittlungsbemuehungen 1937-1938, S.90-93.
- Ostasien im Luftverkehr, Ostasiatische Rundschau Bd15 (1934) in: Fabrizek, Uwe G.: Gelber Drache Schwarzer Adler, 1973.
- Sun Yatsen, Existenzfrage, 1917.
- Sun Yatsen: Brief an Teng Chia-yen in Deutschland 1923, Gesamtwerke Sun Yatsen Bd. 3, p. 9-626.
- Telegramm Gustav Stresemann an deutschen Botschafter in Paris Leopold von Hoesch 01.10.1927, ADAP (Akten zur deutschen Auswaertigen Politik) B, Bd.7, Nr.2, S.1-3.
- Primary Documents -Treaty of Versailles, 28 June 1919. First World War.com [2009-01-10]



# **Between the World Wars Chinese-German Relations: 1919 to 1941-1945**

Yu Ho-Fang<sup>\*</sup>

## **Abstract**

This study on the history of German-Chinese relations is part of a larger research and book project in cooperation with the Graduate Institute of European Studies, Nanhua University Taiwan, and the Dolphin Foundation for Science and Culture Malta. The project is ongoing until 2014; the task of the project is the scientific research and historiographical representation of the history of German-Chinese relations from the beginning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1861 to the present day. The scopes of the study are in addition to the diplomatic political events the economic relations as well as cultural exchange and military security.

This study provides an overview of the period from 1919 to 1941-1945, in the period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to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approximation restart after the First World War leads to the Sino-German agreement on May 20, 1921, the historic first contract that China has signed with a Western nation on the basis of equality of both sides. Section A represents the relation 1919-1927, in the period of the Beijing government and the warlord period before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of the Kuomintang, The diplomatic relations between Germany and China existed at that time to the government in Beijing, as all other states did. As to the government in Canton there were unofficial contacts. After the Northern Expedition in 1928, Germany was the first European states with diplomatic recognition of the National Government in Nanking. The second period deals with the relations of

---

<sup>\*</sup> Senior Research Fellow,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nhua University





Germany to the Nanking government from 1928 until 1941. By 1937-1938 this was a time of close and intense German-Chinese cooperation. From 1938 the German Empire, however, approached to Japan. The German-Japanese alliance then lead to the break with China and China declared war to Germany on December 9, 1941. However, the German Empire had diplomatic relations until 1945 with the Japanese puppet government under Wang Jing-wei.

**Keywords:** History, Diplomatic Relations, Foreign and Security Policy, Commercial Relation, Military Cooperation

